

台灣主體意識與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對抗：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兩岸關係

趙建民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兩岸之間關係因為無法解決結構轉化而出現運作障礙，又有可能因下列因素更加激烈：雙方政、經實力的增長以及政、經轉型以後，所展現的新興民族主義的抗衡；亞太經濟區域化與自由化下的合作與競爭；安全與經貿利益的平衡問題；事實主權的認定問題等。本文將針對兩岸新興的主體意識，以及國際結構的變化所引發的相關問題，探討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關鍵詞：兩岸關係、結構轉型、大陸民族主義、台灣意識、兩岸政治分歧、國際政經結構

* * *

一、前言

自民國七十六年底政府開放探親以後，兩岸交流逐漸增加，至一九九三年四月舉行歷史性的辜汪會談達到最高潮。然而，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在台灣舉行中國有始以來第一次民選總統的前夕，中共卻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並對鄰接台灣本島水域發射飛彈恫嚇，此又構成兩岸自一九五八年金馬炮戰以來最嚴重的衝突事件，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切，美國並因此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前來，此一事例不但說明當前兩岸關係的脆弱性，更顯示了台海地區的安定與否，乃當前國際



社會是否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人將一九九六年台灣危機歸之於兩岸在國際外交上的衝突，進而主張台灣應接受中共的「一個中國」主張，立即停止「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的互動」^①，作為化解當前兩岸僵局的辦法。

兩岸之間自一九八七年以來的交流經驗證明，雙方的交流，並未依照以新功能主義為基礎的整合理論的預測，認為互動關係的強化終將導致關係的全面良化，以制度之匯合消除雙方敵對，達到和平演變中國大陸有利統一的終極目標^②。兩岸交流不論在質與量方面都已大幅提升，互動領域已經從經貿、文化、與民間性質的交流活動，擴散至政治性與半官方性的接觸，在一九八七年底至一九九五年六月中共對台海試射飛彈期間，雙方關係似乎出現一上升曲線^③，這種曲線發展頗符合新功能主義之交流模式，然而，本文認為兩岸之間受到宏觀結構因素的限制，衝突有其根源，非微觀的個別政策所能解釋。在一九九七年初台灣遭受口蹄疫肆虐之際，中共表達願意協助的意圖，這也是兩年來中共首次主動創造溝通；稍後，海基會副秘書長李慶平也獲准赴大陸訪問，台港航線也在雙方各自退讓互不懸旗的方案下，達成暫時協議，一時之間，兩岸關係是已曙光初露。然而兩岸之間假如無法解決因為結構轉化而出現的運作障礙，雙方之間的衝突，有可能因下列因素更加激烈：雙方政、經實力的增長以及政、經轉型以後，所展現的新興民族主義的抗衡；亞太經濟區域化與自由化下的合作與競爭；安全與經貿利益的平衡問題；事實主權的認定問題等。本文將針對兩岸新興的主體意識，以及國際結構的變化所引發的相關問題，探討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二、結構轉型與調適

兩岸之間在九〇年代初期形成的若干共識，已因雙方內部和兩岸之間情勢的發展為之改觀。辜汪會談的召開，顯示了兩岸之間近半世紀以來，第一次出現若干共識性意見，堪稱「辜汪緩和」。此一緩和和勢的形成乃基於下述背景：(一)暫時擱置政治分歧：為了促使歷史性的辜汪會談順利召開，中共方面不再堅持將雙方各有解釋的「一個中國」原則，作為會談之先決條件，雙方代表乃在會談前夕達成各自表述的協議^④；(二)新功能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漸進式交往原則：雙方理解，統一乃一漫長的過程，經貿交流與人員的交往，效果終將持續擴散 (spill-over)，為往後的政治方面的交往預作準備。受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影響，在西方資金對大陸的政治風險評估仍高度不確定之際，台灣成為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外來資金，同時，兩岸貿易迅速擴大，

註① 見 Chen Qimao, "The Strait Crisis: Its Crux and Solu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XVI, no.11 (November 1996), pp. 1055~1066; 李鵬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全國人大會議上的講話。

註② Gary Klintworth, *New Taiwan, New China: Taiwan's Chang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 Y.: St. Martin's Press, 1995), p. 174.

註③ 吳新興，*整合理論與兩岸關係之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八十四年），頁三五二。

註④ 趙建民，*兩岸互動與外交競逐*（台北：永業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第一章。



至一九九六年已達二百二十億美元。中共對台灣在一九九一年三月通過的「國統綱領」，提出兩岸交流由交流互惠、互信合作、協商統一之三階段漸進交往原則，無力反對。同時，交流所衍生之法律與事務性如偷渡客遣返、漁事糾紛與文書認定的問題，雙方決定優先協商解決；(三)對統一之務實解釋：雙方體認統一乃一長期之過程，必須以暴力以外的其他方式完成，雖然中共迄未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並設定若干用武的時機與條件，但是台北方面於一九九一年宣告終止動員戡亂，結束敵對，對中共在一九七九年提出的和平統一設想，可以說是最具體的回應。(四)雙方對國際之權力平衡關係相對滿意，沒有遽然改變的意圖：雖然正式承認台灣的邦交國僅三十個上下，李總統上台之初仍能立即訪問無邦交的東南亞國家，中共對這些並非重大之非官方訪問似也默許，雙方因此得以維持一個「非均衡式」之權力平衡狀態。

然而，上述共識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出現了變化，中共顯然無法信任「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原則的普遍適用性，擔心擴散於國際層面，因此，自原本同意將此原則適用於兩岸之間的立場退縮，兩岸之間能否經由經貿擴大交流達到統一的想法，出現了新的疑慮，政治上中共對台灣的敵視絲毫不減，但在經濟上，台灣對大陸的依賴關係卻日增，造成台灣對大陸「以商圍政」的疑懼。根據經濟部的統計，從民國八十年到八十六年五月底為止，將近一萬二千家的台商對大陸投資共計七十二點六億美元，占台灣對外投資總額比重達三十五·四%。另外根據中共統計資料，累計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台商實際投資金額達一百五十五點四億美元，台灣成爲僅次於香港的大陸第二大外資來源^⑤。而在貿易方面，台灣對大陸地區貿易總額逐年增加，到一九九六年達二百三十七億美元，占台灣對外貿易總額的十·五%，其中對大陸地區出口有二〇七·三億美元，占對外總出口比重十七·九%^⑥。大陸地區已經成爲我僅次於美國及香港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及我國第六大輸入地區。台灣對大陸投資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例遠超過香港及新加坡，面對大陸敵意與台灣對大陸經貿依賴日增的困境下，台灣既沒有議論「圍堵」的空間，也沒有討論到中共於國際體系爲思考的「建設性交流模式」的餘地，只能被動的提出「戒急用忍」，以期在兩岸政經發展中尋找一較爲平衡的交流策略。

一九九三、九四、九五等三年中，大陸每年平均吸收外資實際到位三百三十億美元，台資約占百分之十。在飛彈試射後，以和平手段作爲兩岸解決問題的方式也就不復取信於人。

內、外結構的轉變，使得雙方在調適上出現落差，而兩岸在國際政治上之權力失衡，使得衝突益加激烈。中共顯然將李總統所大力推行的務實外交，曲解爲謀求「獨立的主權國家」的作爲，無視中華民國已經是一主權完整、獨立的國家的事實，堅持

註⑤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間，港澳對大陸累計實際投資一〇一·八億美元，台灣一四九億，美國一四二·九億，日本一四一·九億。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印，兩岸經濟統計月報，民國八十六年六月，頁二八、四六。

註⑥ 同前註。



表一 各國對大陸出口貿易依賴度與投資額

單位：億美元

地區	1992年 依賴度	1995年 依賴度	1995年 貿易額	1996年 貿易額	1993年 投資額	1994年 投資額	1995年 投資額	1996年 投資額
香港	26.46%	27.44%	82.2	445.7	178.6	20174.8	205	212.6
台灣	14.02%	16.52%	178.7	178.8	31.4	3391	31.6	34.7
韓國	2.08%	6.38%	290.3	169.8	3.8	722.8	10.4	13.6
日本	1.76%	4.96%	200.5	574.6	13.2	2075.3	31.1	36.8
新加坡	1.89%	2.66%	106.7	68.9	4.9	1179.6	18.5	22.4
美國	1.67%	2.02%	117.5	408.2	20.6	2490.8	30.8	34.4
德國	0.83%	1.46%	75.1	137.1	--	--	--	--
義大利	0.77%	1.17%	27.1	51.8	--	--	--	--
西班牙	0.39%	0.92%	8.7	--	--	--	--	--
法國	0.65%	0.88%	26.7	44.9	--	--	--	--
英國	--	--	--	--	2.2	688.8	9.1	13

資料來源：林昱君、陳添枝，台商對大陸投資的新趨勢與舊危機研究；投資額指實際投資額，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印，兩岸經濟統計月報，民國八十六年六月，頁四四。

台灣拓展外交只能限於經濟和文化面^⑦。台灣的最大邦交國—南非共和國—於一九九六年年底宣布將於一年後與中華民國斷交，改與中國大陸建交。五個月後，巴哈馬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在南非斷交具體化後，台灣的邦交國不但在數量上將更見單薄，在邦交國的質量上也將更居弱勢。一九九七年三月中共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率領商務代表團訪問台北在中南美洲的邦交國，在此前後，有關巴拿馬、瓜地馬拉、海地、哥斯達黎加與中華民國邦交不穩的傳聞不斷，兩岸在國際上之權力平衡似已根本動搖。另一方面，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一九九七年四月訪問俄羅斯，雙方簽訂協議，「反

註⑦ 中共新華社評論，見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日，第九版。



對單一霸權」支配國際事務，以實際行動支持雙方於一九九六年締結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⑧，又於年底訪問美國，達成類似夥伴關係，進一步拉大兩岸在國際上競爭的距離。

在國際組織方面，西方國家已就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一事達成共識，希望中共儘早入會，但是中共先台灣入會的默契似已建立。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以觀察員身分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新構想，卻在提出後立即為 WHO 方面否決。這些事件充分說明了當前兩岸之間在國際外交方面的競爭，非但沒有因為雙方交流的增加，改善過去之「零合」遊戲規則，反而有可能因為兩岸之間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更加深化。假如中華民國的國際參予權無法獲得適度的滿足，兩岸之間關係不可能平穩。

三、台灣的新興國民主義

作為一個甫自威權政體轉型為民主國家的台灣而言，過去過於重視意識形態的時代已經不再，加上統獨長年爭議不斷，而台灣淺薄、多變、多元與競爭激烈的人文與政經特質，更需要建立一套社會意識與共同體意識，有人將此一新的以國民為核心的意識稱之「國民主義」^⑨。

在建國黨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建黨後，台灣有關統獨的政治光譜已告完成，主張統一的新黨和主張台獨的建國黨立於兩極，國民黨與民進黨代表中間的多數意見。事實上，原本基於反國民黨政權、要求政治參予的民進黨，在威權統治結束總統民選以後，鑒於台獨對選票吸取的不利影響，又見識了中共試射飛彈的不友善舉動後，政策已經出現重大改變，承認台灣已經獨立的事實，不須二次宣布獨立，表示國民黨不再是外來政權，未來兩黨之間的競爭，將是「兩個本土化政黨之間的和平競爭」^⑩，放棄激烈的抗爭，以反腐與建立效能化的政府作為新政策的主軸。民主化的完成、國民黨的本土化、和民進黨對台獨的轉趨務實，都是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其結果，是統獨意識形態作為影響台灣重大政策的作用，似已快速下降，在一九九七年三月桃園縣縣長補選的選舉當中，民進黨候選人呂秀蓮高票擊敗國民黨方力脩和新黨的賴來焜，意義不尋常。同年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更首次擊敗國民黨，在二十三席中獲得十二席，國民黨保有五個偏遠席次。選舉過程中，公共政策已取代統獨議題，成為候選人競選的最主要訴求。

新的共識表現於下列方面：（一）政策上有關統獨的爭議減低：一九九六年年底召開的國家發展會議，主要政黨對未來兩岸關係的擬定，在共同意見中有高度的共識，其

註⑧ 中俄於一九九六年在北京簽署「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協定」，有關江澤民在一九九七年四月訪俄，與葉爾欽簽署公報表達反對單一霸權的文字，見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十版。

註⑨ 蕭全政，台灣新思維：國民主義（台北：時英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 XV～XVII。

註⑩ 「朝野和解凝聚共識化解危機」，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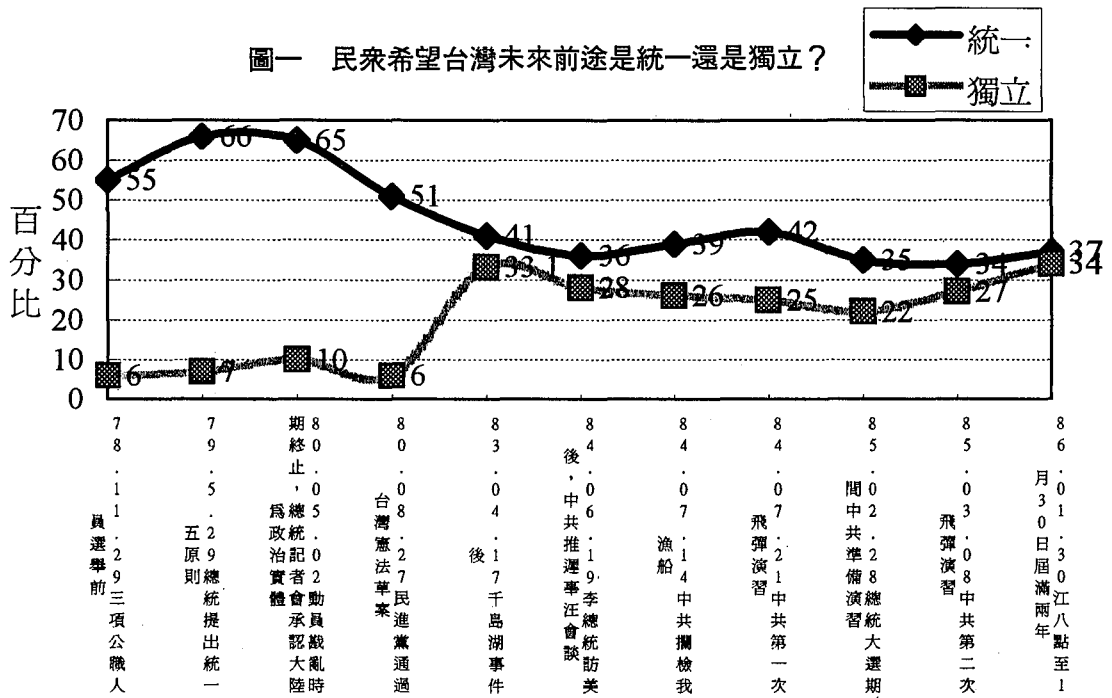
中有關中華民國主權、兩岸關係開展應基於台灣安全與發展為先之「台灣優先」的考慮、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互為裡表相輔相成等，均是跨黨派的意見。前述桃園縣長補選，民進黨候選人呂秀蓮在面對大量傳統上與民進黨距離甚遠的軍眷票，加上相當的客家票（國民黨執掌選舉兵符的吳伯雄秘書長為客家人），卻能與陳水扁同赴慈湖、大溪謁陵，消除軍眷票的疑慮，終於獲得勝選。(二)新社區意識興起：台灣政經轉型所引起的本土化運動涉及層面廣泛，使得執政的國民黨不僅在權力結構方面與台灣的人文發展密切結合，社會與政治的主流意識，也更能反應民間社會的脈動，對台灣文化、歷史、文字、語言都有了新的肯定與詮釋。可以說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形態於焉形成。(三)公共政策共識增加：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合作增加，雙方不僅在內政如修憲的觀念與步調上相互配合，有關凍省的結論迅速作成，在外交方面的作法亦理念接近，與過去大不相同。譬如「國發會」中有關台灣為了生存與發展，必須積極推動對外關係；積極運用區域性及全球性之安全與合作機制，以確保台灣安全；加入聯合國乃一長期奮鬥目標，不宜過分急躁；目前宜積極推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非政治性之國際組織，避免過分刺激中共。對照過去民進黨強烈主張不惜代價推動重返聯合國的政策規劃不可同日而語。外交部在一九九七年提出以「觀察員」的方式，作為提高國際社會參與度的務實方案，亦獲得反對黨的默許。(四)黨際合作與黨際民主化的程度增加。過去統獨高度爭議時期，主要政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對峙，導致兩個陣營關係的全面斷絕，雙方連喝咖啡都十分困難。然而在一九九四年年底省市長選舉將統獨爭論帶至最高點後，新當選台北市長的民進黨籍陳水扁市長，卻相當幅度的借用國民黨及非民進黨籍人士，首創不同意識形態黨派之間在人事方面交流的先聲。近一年來有關「聯合內閣」的傳聞不斷，呂秀蓮被延攬為國策顧問，也是她獲勝的有力因素之一。

台灣內部政治共識的日漸凝聚，使得長期以來困擾國家發展的統獨爭議為之淡化，伴隨而來的，是政治上的中間與溫和路線的出現，這種中間路線大體具有如下特質：(一)強烈反對中共霸權的心理意識：對中共的強力壓制漸感不耐，主張以實力對抗中共，亦即一般所謂的制衡政策^①。自千島湖事件以後，兩岸關係持續低迷，台灣方面支持統一的民意迅速下降^②。不同的民調顯示，主張無條件儘速統一者，都已降至十分單薄的五%以下。圖一顯示國內民衆主張兩岸儘速統一者，已自民國七十九年百分之六十六的高峰，降至民國八十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九六年三月總統大選前，北京在台海水域發動飛彈演習，使兩岸關係降至八〇年代以來最低點（見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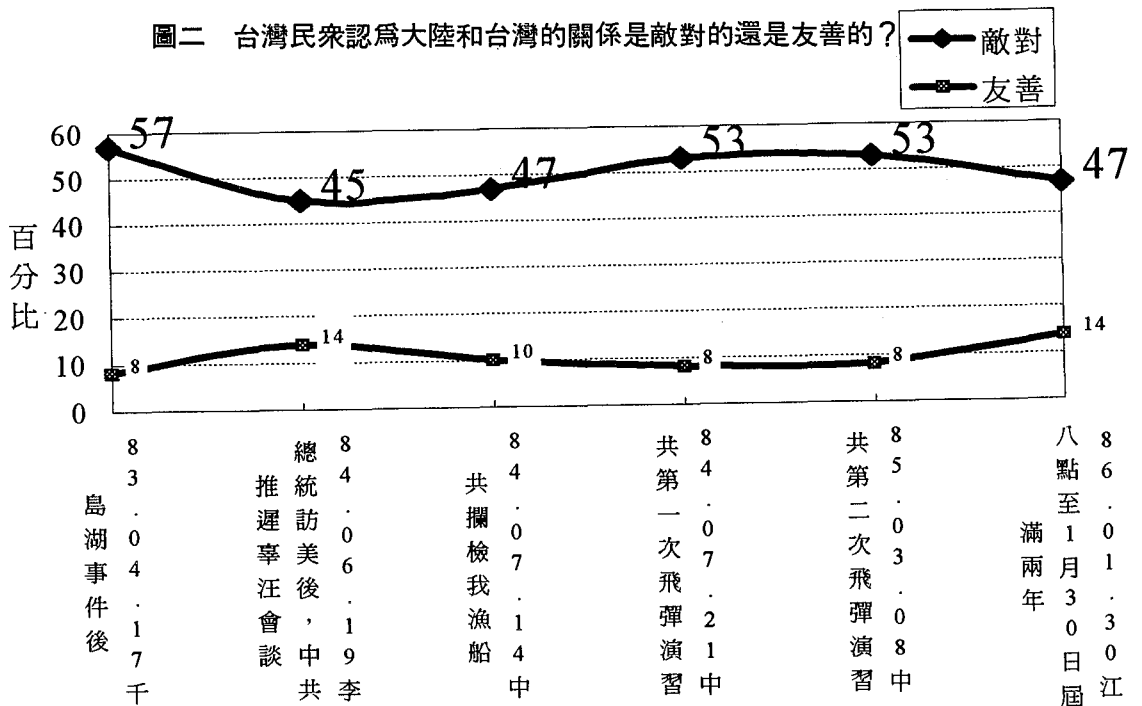
註① Wu, Yu-Shan, "Theorizing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 Analogy with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Issues & Studies* (Taipei), September 1995, pp. 1~18.

註② 趙建民，「中共對台獨因素的互動解釋」，*問題與研究*（台北），第三十五卷第三期（民國八十五年三月），頁二九~四〇。





資料來源：由聯合報民意調查中心提供。千島湖以前民調使用統一 vs 獨立兩種選項，自八十三年七月七日政府發表大陸政策白皮書後所作民調，則提供獨立、統一、維持現況三種選項。



資料來源：由聯合報民意調查中心提供。



影響至鉅。一般人民認為北京政府態度對我不友善的比例，也高居不下^⑬，圖二顯示自八十三年千島湖事件以來，平均有五成左右的台灣民衆認為兩岸關係處於敵對。(二)政經分離、逐漸降溫的大陸政策：制定政策時中共因素的重要性降低，決策的自由度提升，過去以政治穩定為優先的大陸政策已經過時^⑭，代之而起的，是效率的考量（如「凍省」）。與民國七十九年召開的國是會議討論修憲共識有所不同，民國八十六年年中進行的修憲，中共因素已幾無影響，一九九六年八月李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強調台灣經濟發展以大陸為腹地的說法必須檢討，對大陸投資應當設定適當比率，個別公司對大陸的投資比率也應有所限制，在三通和轉運問題上不應投注過多的規劃與人力。在擔心對大陸依賴過深陷入被動而兩岸關係又不明朗之際，「戒急用忍」政策乃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形成。(三)積極主動的擴張式外交政策：中間路線對兩岸關係與外交拓展採平行對待政策，認為兩者並無特別關聯，而發展對外關係的優先順序，又要勝於兩岸關係^⑮。不論是對聯合國或其他官方或非官方外交活動的推展，都不因中共的抗議或威嚇稍作改變。(四)準國際主義的兩岸定位：認為唯有採取「準國際關係」定位，才能解決兩岸之間的問題。國發會中有關此一論點的提出，雖未獲得通過，但頗能反應台灣方面長期以來對兩岸定位不滿的心情^⑯。此一新興意識的出現，已經改變了既有的兩岸關係互動模式。

四、中國大陸的新興民族主義

中共對外開放的幅度愈大，內部反彈與排斥的力量也就愈大。在內政方面，圍繞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已經迫使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兩位總書記一胡耀邦和趙紫陽下台，由於八〇年代推動改革的黨內開明派和民間自由派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遭到完全封殺，新保守主義抬頭^⑰，主張穩定和經濟發展壓倒一切、中央集權，有一段時期學術界還主張毛澤東思想復古，使得九〇年代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核心」在政策上趨於保守。

註⑬ 政大選研中心在一九九四年二月所作的民調顯示，62.1%的民衆認為中共對我方政府不友善，認為友善的只有5.3%（其中認「還算友善」者占5.0%，「很友善」者占0.3%），同一民調認為北京政府對台灣人民不友善者占35.6%，友善者占19.5%。該中心在一九九五年八月所作的調查，上述統計數字分別是73.4%、2.3%、36.6%、14%。

註⑭ 趙建民，「省市長選舉後的大陸政策」，*亞洲研究*（香港），第十四期（一九九五年），頁五〇。

註⑮ 幾乎可見到的民調都有相似的結論，如行政院陸委會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委託政大選研中心調查，八十五年八月委託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調查即是。

註⑯ 台北方面對中共將其置於地方政府的不平等地位未能滿意，自李登輝於一九八八年擔任總統以來，開始主動追求明確化定位，見邵宗海，*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台北：華泰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頁一五四。

註⑰ 劉曉波，「要麵包，更要自由：評九十年代中國政治保守主義的三派理論」，*開放雜誌*（香港），一九九六年九月，頁四八～五〇；另見胡平，*中國民運反思*（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序言。



這種新保守主義在內政上主張集權，加強中央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⑧，在對外關係上，則表現了相當排外的民族主義傾向。此種排外主義具有如下特質：(一)強烈反美與「中國威脅論」的認知：前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相繼崩潰，此一歷史性事件顯然予中共相當壓力，認為是西方國家瓦解社會主義政權的代表作^⑨，此事件與西方記者對「八九天安門事件」的同情報導，以及西方國家政府對被中共通緝的大陸學生、學者的支持與接納，埋下了中共在政治上敵視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種子。新一波反美情緒似乎始自一九九三年北京政府申辦奧運失敗，許多人認為是美國人的陰謀。近年來美、中知識財產權的爭論，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對知識產權的條款獲得強化後，更形突出，北京被迫公開掃蕩盜版光碟，對許多大陸民眾而言，無異於清末列強壓迫中國讓步的作法。最嚴重的事例，是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電視台體育記者在轉播奧運開幕式時，當大陸代表團入場時，提出中共飛彈威脅台灣、人權狀況不佳、侵犯知產、游泳選手服用禁藥等評論，引起全美地區大陸留學生的抗議，迫使 NBC 電視台公開道歉。中國大陸報導該次奧運賽事，不乏提到運動員吃不到中國菜，乃因美國恐懼中國強大，因此「耍陰謀」不敢面對中國大陸云云^⑩。「中國威脅」乃順理成章地成為杯弓蛇影式的推論，「中國可以說不」式的說法應運而生，認為在國際社會上中國需要與美國保持距離，防止美式腐敗文化輸入，主張「焚燒好萊塢」^⑪。在此考慮下，與俄羅斯適度結合，締結「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反對「單一霸權」並對「擴大和加強軍事集團的企圖」表示憂慮也就發之於外。中共的對外關係戰略出現了新的思考。(二)對台獨分裂的擴大解釋：民族主義的高漲與對西方（尤其是美國）「陰謀」的推論，使得北京當局對涉外與主權事務極盡敏感。因此，李登輝總統的美國母校行是「分裂行徑」，申請加入聯合國是「台獨」、「二個中國」的表現，「國發會」的召開以及「二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提出，也都是「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向台獨立場「大大靠近了一步」^⑫。在台灣的「一切作為幾乎都是為台獨」的理解下，對國民黨的政策似已進入「敵我矛盾」之難以妥協的境地。(三)擴張式的外交政策：在經濟實力漸增，對外在環境的評估又欠有利的情況下，北京政府採取擴張式的外交政策乃勢所必然。對美政策表現強硬，此可由中美雙方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談判中，中共態度頗為強硬可以為證，對傳統上中共認為所屬水域的南中國海的態度轉趨積極，新的擴張式外交政策，恩威並用的手段更為明顯。法國在一九九四年承諾停止對台軍售，李鵬訪問巴黎時，立即簽約採購空中巴士客機。一九九七年四月法國拒絕連署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中共人權的譴責案，一個月後，中共與到訪的法國總統席拉克（Jacques Chirac）簽署了價值十五億美元，購買

註⑧ 王紹光，胡鞍綱，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瀋陽：遼寧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註⑨ 趙建民，「政治動員」，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

註⑩ 曹長青，「美國害怕我們強大！」，開放雜誌，一九九六年九月，頁三四～三五。

註⑪ 宋強、張藏藏、喬邊，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一二五。

註⑫ 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第一版。



了三十架空中巴士的契約^②。同時對發起譴責案的丹麥，則不斷出言恐嚇。(四)擴充軍備，以達局部戰力優勢的戰略平衡策略「固北向南」：對於外在環境並不十分友好的評估，已經強化了中共進一步擴軍的決心。九〇年代以來，中共軍費維持著每年二位數字成長的速度。一九九六年三月飛彈試射，中共軍事戰略家察覺到若要對台灣造成威脅，只有在制約美國第七艦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中共新近自俄羅斯購買兩艘 Sovremenny 級驅逐艦，似乎有以其超音速飛彈嚇阻美國的太平洋艦隊之意。此外，中共已獲得三個中隊七十二架相當於美國 F-15 的蘇凱 27 型空優戰機，據傳中共有意購買二〇〇架，並已簽訂採購四艘基羅級 (Kilo-class) 潛艦。據聞中共派遣大批軍事專家在俄羅斯境內進行武器搜括^③。在俄羅斯擔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向東擴張的壓力下，中俄於一九九六年四月簽訂「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 關係，並於一九九七年四月江澤民訪俄時，達成邊境裁軍的協議，「固北向南」策略極其明顯。

內部對開放政策步調的不協調，以及認識上出現的偏差，促使中國大陸訴諸民族主義，作為追求統一的主要訴求。中共常稱：現代中國是一部殖民侵略和充滿屈辱的歷史，因此也是中國人民為獲得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而奮鬥的歷史。自此一邏輯推演，中共進一步認為「台灣問題」的起源和未來，應置於此一背景中來加以了解。因此，中國必須在繁榮與強盛之下再統一。台灣獨立顯然違反此一目標，應予譴責^④。

這種民族主義意識，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和東歐發生變化，中共成為少數僅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國，使命感的驅使加上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的成長，更加明顯。經濟力量的提升，也促使中共提出重新檢討當前亞太國際政經秩序之呼聲。

繼一九九五年年初自菲律賓手中攫取了「美濟礁」(Mischief Reef) 後，一九九七年三月中共又占據了距越南陳美東角九十英哩海面上的天然氣礦區^⑤。中共以實力作為解決南海爭議的作法，可以自中共極力發展遠洋軍事投射力量，並積極更新各項軍事裝備的作法中略窺一二。此外，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率最快速的地區之一，加上中共在國際軍火市場上所展現的積極性（據聞一九九六年一月伊朗飛彈快艇試射中共提供的新一代 C 八〇二巡弋飛彈，美國海軍迄未擁有有效的反制措施，而中共更進一步向外提供單一載具發射三枚飛彈的陸基 C 八〇二型飛彈）^⑥，這些因素都將使亞太安全體系更趨複雜。

中國大陸新興民族主義的興起，已使兩岸關係蒙上緊張的陰影：第一，加緊對台灣直接壓力，緊縮台灣的外交空間。一九九六年三月飛彈試射，南非共和國的轉向，以及積極拉攏台灣既有邦交國的作法，都是例外。例如瓜地馬拉和台灣維持邦

註^② AWSJ, May 16~17, 1997, p. 3。

註^③ FEER, March, 13, 1997, pp. 20~21。

註^④ 趙建民，「海峽兩岸統一政策之比較」，*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四卷第三期（民國八十四年三月），頁三六。

註^⑤ Gerald Segal, "China's Creeping Assertiveness," AWSJ, March 27, 1997, p. 8.

註^⑥ Kenneth R. Timmerman, "And Now for the Real Arms Race," AWSJ, March 25, 1997, p. 12.



交，支持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中共乃於一九九七年年初，否決了瓜國向聯合國要求派遣和平部隊的請求，迫使瓜國停止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四個月後，巴哈馬也在中共的壓力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一九七九年「葉九條」承諾統一後台灣有外事權，一九九五年一月江澤民發表對台灣政策的八點聲明當中，也同意台灣同外國發展經濟文化關係，但是在一九九七年四月在漢城舉行的東亞運動會中，中華民國代表團官員的貴賓身分，卻在中共的壓力下，臨時被降級；台灣代表團在國際運動場合中被迫改名、換旗之事屢見不鮮。台灣在非政治性政府間或非政府間之國際組織（NGO）之身分，亦經常受到排擠，一九八九年「亞洲開發銀行」（ADB）同意中共入會的申請，而原為會員的中華民國被迫更名為「中國台北」（Taipei, China）。台灣雖是「亞太經合會」（APEC）的成員之一，台海地區也是當今最緊張的地區之一，但卻無法出席具亞洲地區集體安全象徵意義之「亞洲區域論壇會議」（ARF）。中共對台灣外交空間的全面封殺，意圖至明。第二，增加對台灣的心理戰，飛彈試射期間將南京軍區改名「南京戰區」，縱容軍方散播解放軍反對台獨的言論^⑧，一再利用各種場合說明中共不能放棄對台使用武力^⑨，可為說明。第三，中止與台灣經貿以外的各種接觸，不惟辜汪會談後雙方所達成的兩會之間種種溝通管道為之斷絕，兩岸之間進入最後商談階段的有關偷渡、刑事犯遣返和漁事糾紛處理的問題，亦全面中止。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大陸後，港台之間各種交流如何進行，諸如航運以及十幾個台灣駐港機構的地位等，中共或是拖至最後的時刻，或是根本不理。第四，改寄望於台灣人民。一九七九年中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中，提出既「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說法，此地所謂的「當局」，指的顯然是執政的國民黨，但在飛彈試射後，中共已將兩岸的衝突焦點帶至國際層面，試圖透過華盛頓達到抑制台灣的目的，一改過去認為兩岸之間乃國內事務的說法。副總理朱鎔基在接受美國新聞週刊訪問時，將美國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視為台灣方面「不會自台獨退縮」的依據便是^⑩。

五、政治分歧與治權的爭議

兩岸結構因素的轉變，強化了既有的政治分歧，使得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上的差距日益擴大，台港之間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的一個多月前，才在幕後的北京放棄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達成不掛旗的協議。雖然兩岸近來都強調，儘速協調結束敵對狀態，簽訂和平協議^⑪，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兩岸就此一問題的冗長討論過程中，

註^⑧ “Captain’s Warning,” *FEER*, April 3, 1997, p. 12.

註^⑨ 江澤民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訪美記者會上，公開申明不放棄使用武力乃針對「外國勢力」和「島內分裂力量」。

註^⑩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九日，第九版。

註^⑪ 李總統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的就職演說中，要求中共正視兩岸結束敵對狀態此一重大問題，同註^⑨，江八點中亦有類似主張。



勢須就當前橫梗兩方最敏感的問題有所諒解。

兩岸之間似乎也已逐漸瞭解到，假如政治方面的紛歧不予化解，其他方面的交流都將受到影響，這是為何雙方都將政治方面的接觸與會談，列為自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總統訪美後中斷的兩岸會談中的優先議題。可以預見的是，不論是結束敵對狀態或高層互訪，仍將牽涉複雜的主權與治權爭議以及認識上的差距。中共一再譴責台灣方面偏離「一個中國」，因此堅決表示須將「回到一個中國原則」作為恢復會談的先決條件。但是，「中國」的內涵究竟如何表述？兩岸之間有關「一個中國」的界定（或不界定），是否可以適用於國際層面？雙方是暫時迴避主權爭議？還是「原則問題必須先行確立」？以目前狀況而言，這些問題似乎仍然無解^②。然而，雙方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陸續推出若干建議，以圖找尋一個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台灣方面在一九九七年年初由新聞局提出「一個分治的中國」的概念^③，避開中共較為敏感的「分裂」字眼，政府方面也一再使用「台灣加大陸等於中國」以及「共享主權」等較為中性的文字表叙。於此，中共方面似乎也有意回應，據聞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會見台灣訪客時，提出「一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④，雖然北京方面事後否認此說法^⑤，但也反應出中共對於兩岸之間在政治方面相持不下亦感無奈的事實。除了官方力圖克服的政治困擾外，民間亦借箸代謀，提出諸如「中華兩岸聯合會」的構想，希望在兩岸官方參與的基礎上，組織一個「過渡性、功能性的兩岸政治架構」^⑥，化解法統衝突，各自保有主體地位，形成如「亞太經合會」（APEC）式的平等對話機制，避開「一國兩制」或「中華民國」的尷尬。

另外一項有關政治談判的棘手內容，是兩岸如何規範國際層面上行為模式的問題。目前雙方都已認識到外交爭執是兩岸紛歧之基本內涵，因而興起「外交休兵」的呼籲，但是，中國大陸提出的版本，明顯的是「一國兩制」式：台灣不得加入聯合國，不得參與「國際活動」，不得與中共邦交國來往……等，此與台灣方面所想像的各不相擾的「平行外交」，恐有天壤之別。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亞太經合會」年會當中，中共拒絕台灣方面提出申辦公元二〇〇三年年會的申請，也否定台灣代表團為了因應亞太金融危機所提出了成立一地區性基金因應不時之需的提議^⑦。這種主張台灣片面凍結對外活動（有時甚至涵蓋經貿領域）的說法，顯然無法為台灣方面所接受，現階段兩岸在國際社會已經發展出來在經貿文化領域之互

註② 有關這方面的爭議，參閱趙建民，「當前兩岸關係的癥結與展望」，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二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五年八月），頁四～一二。

註③ 行政院新聞局編印，透視「一個中國」問題（小冊子）（台北：行政院新聞局，民國八十六年三月）。

註④ 見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二版。

註⑤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第A三版。

註⑥ 見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九版。

註⑦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三日，第九版。



動模式如 APEC 模式或奧運模式，也都並非成功案例，運作上仍不平順，台灣方面的不滿情緒，正持續累積^③。最近台灣方面有人提出以「新思維」的方式，化解兩岸在外交層面的無謂循環衝突，由於台灣可以運作的空間較小，而其國際空間又不可能完全被封殺^④，因此，必須由中共首先在台灣外交大本營的中南美讓步，不必在該地區點燃外交戰火，以外交休戰的善意，換取台灣下一步的善意回意^⑤。

六、國際政經結構因素

自原本實行共產主義的蘇聯和東歐政權在九〇年代紛紛崩潰以來，國際社會進入了所謂的「後冷戰時期」，新的國際秩序於焉確立。此一新秩序大致可以歸納出下列特質：(一)意識形態的敵對消失：蘇聯和東歐發生巨變，使得原本以意識形態一分為二的所謂的兩極體系消失，學者將這個趨勢稱之為「歷史的終結」。意識形態作為支配的國際衝突的因素已成歷史，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證明早成昨日黃花。國際社會進入了多極競爭和多文化爭鳴與衝突的年代。(二)經濟因素重要性上升與區域經濟組織的發展：冷戰的結束，象徵了人類社會有始以來空前龐大的軍備競賽時代的結束，經濟的發展成為每個國家制定政策的第一優先考慮，為了擴大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的效果，各鄰近國家紛紛成立區域性的經濟組織，期望以較低的關稅（或根本加以廢除），達到經濟上增進彼此互通有無的目的。以西歐為主的「共同市場」成員，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簽訂馬斯垂克條約，建立「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以期在金融、國防、外交、甚至內政方面，進一步整合，逐漸朝向歐洲聯邦的方向發展。北美的美、加、墨三國，也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承諾相互之間在關稅貿易和投資方面給予優惠。「亞太經合會」（APEC）也於一九八九年成立，兩岸同時是十八個正式成員國之一，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於日本大阪舉行的年會當中，各國承諾將在公元二〇一五至二〇二〇年間，達到貿易自由化的目標。(三)民主化的趨勢：自一九七二年以來，政治上採行民主體制的國家，已經從原來的四十四個，增加到一〇七個，占當前全球一八七個國家的百分之五十八。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超過半數的人口，生活在自由和尊嚴的制度之下，有人把此一民主化的發展稱之為「全球民主革命」或「第三波民主化」，而蘇聯和東歐的解體和民主化，則將第三波民主化推向最高潮^⑥。此趨勢雖然腳步逐漸放緩，但威權專制的風潮顯已過時。(四)不同種族和文化的衝突增加：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社會，重大衝突固然明顯減少，但是區域性的衝突與爭執，卻未曾稍減，使得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中東、非

註^③ 趙建民，「亞太多邊對話攸關區域安全」，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三日，第十一版。

註^④ 八〇年代以來台灣在經濟和金融方面的成就使得她已成為經濟發展和新興工業化經濟經歷政權轉變之重要參考經驗，影響力不容忽視。見 Klintworth, *New Taiwan New China*, chapter 1 & 6.

註^⑤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及八月三十日，社論。

註^⑥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91)



洲等地，仍然處於動盪，亞洲也不得免。造成後冷戰時期區域性國際爭端不減的原因，有人將之歸因於區域性價值的抬頭，也就是所謂的「文化（或文明）的衝突」。由於原來意識形態作為社區凝聚的膠合作用消失，加上歷史、傳統、宗教、語言的不同，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改變了原來的地域認同，而西方國家物質文明的進步，也激發了其他民族的尋根風潮，重塑了「亞洲化」、「伊斯蘭化」等地域價值，經濟發展的成功，更增加了這些非西方民族與地區的信心。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文化或文明的衝突，將是後冷戰時期最主要的破壞力量，它不僅是宗教之爭，也是制度、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衝突^②。

冷戰時期對立性意識形態的消除，使得中共與西方之間的交流不再有絕斷性的隔閡。然而，中共作為社會主義龍頭老大的地位，加上經濟發展使得其在國際外交上的地位上升，而區域經濟組織地位的日漸重要，使得「亞洲價值」的訴求高唱入雲，中共也就在此一亞洲集體價值的保護傘下，縱橫於亞太區域經濟之間，免於政治上的孤立。而文化與體制的差異，又使得中共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勢必在經濟利益的考慮與文化與價值的衝突之間徘徊。後冷戰時期全球民主化的趨勢，更突顯了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的封建專制，落後於潮流，加深了此一衝突的縱深。

國際秩序的重組以及中共的迅速興起，迫使亞太各國無不急謀對策。面對新興的中共，西方政府部門主張以交流（engagement）的方式，將中共納入國際政、經、安全秩序，成為東亞安定的力量。在商業利益的考量下，對中共大體採取妥協。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於一九九七年四月討論譴責中共違反人權的決議案，歐盟各國反應冷淡可見一斑。美國副總統高爾在一九九七年年年初訪問中國大陸時，熱心參與美國公司與中共簽訂商業協定的儀式，對中共人權及其他方面的要求卻殊少關懷，引起相當爭議。

然而，中共對外持續擴大輸出高科技及高危險性武器（如據聞資助巴基斯坦發展核武）的作法，重商主義式的貿易政策，以及對人權的漠視，已經引起納中共於當前國際體系是否足以增進國際秩序穩定的質疑。中共可能成為下世紀美國最大的戰略敵手的顧慮持續增加^③。美國國內對中共負面的報導，達到八九民運以來的最高潮，涵蓋政治光譜上自由與保守兩極人士^④。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中共在未來二十至三十年內，有可能成為足以威脅美國利益的超強^⑤。

經濟利益掛帥的作法，已經引起西方國家非政府部門相當的物議。首先，不少人士認為，在主張與中共全面交往的同時，不應忽略中共對其週邊地區遂行企圖心較強之擴張性外交政策的事實，因此，「交往」（engagement）與「限制」（con-

註^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2 (Summer 1993), pp. 22~49.

註^③ 如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 Y.: Knopf, 1997).

註^④ "Making an Enemy," *FEER*, March 20, 1997, p. 15.

註^⑤ 如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局長 (Patrick Hughes) 在一九九七年二月於參院軍事委員會所作的證詞，見 *FEER*, February, 20, 1997, p. 18.



straint) 政策宜並重^⑥，不應一味順應中共，同時亦應避免全面「圍堵」之冷戰心態重現。其次，對於布希政府在國務卿貝克和國家安全顧問史考福特的設計下，放鬆對中共的科技輸出政策，至克林頓政府（尤其是前商業部長布朗）更將對中共的科技輸出（許多是具有軍事用途或軍民兩用性質的二元科技），列為其中國政策之重要一環，許多人已感不耐，要求重新評估。此外，在冷戰結束、蘇聯集團崩潰之際，中共涉嫌在美國國內非法資助議員選舉，以圖影響美國內政的作法，更引起了「陰謀顛覆」的疑慮，美國國內對中共的描述，開始出現冷戰時期名詞，任何為中共說項的言論，都被冠上為中共開罪（Sinopologist）的稱謂^⑦。後冷戰時期一個具有高度信心的美國，和作為亞太區域性權力信心略現的中國大陸的衝撞，格局似已形成。

面對此一新局，「亞太經合會」主張與中共增加交流與對話，作為其所屬區域論壇（ARF）安全機制的運作原則，但成效有限。東協國家至今仍然試圖說服中共公開承諾，信守該組織在一九九二年所作的以和平手段解決南海爭端的「馬尼拉宣言」。中共目前在越南水域進行油氣試探的作法，也未能引起越南以外其他國家的反應。

多邊國際協定既然暫時無法達到化解與中共紛爭的目的，雙邊協定乃應運而生。印尼與澳洲在一九九五年簽訂防衛協議，與其在南沙群島南側擁有世界最大的天然氣礦區不無關聯，兩國並於去年在該礦區附近進行軍事演習，昭示之意甚明。菲律賓加強與英國的軍事交流，兩國國防部長於一九九六年一月簽訂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⑧。越南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加入東協，其集體安全之考慮亦彰。日本首相於一九九六年元月訪問東協時，與越南達成加強軍事交流以及針對中共之安全對話。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布魯赫於三月訪越，提議軍售以及雙方進行策略討論與交流訓練心得等，美越之間軍事關係的加強，亦是指日可待。

日、美自一九九六年六月開始著手修訂的雙邊安保條約，在新的指導綱領中，日本政府一改過去之模稜態度，表明若日本「週邊地區」（surrounding area）發生事端，日本將對美軍提供機場、一般港埠、補給燃料及對美軍搜索救難等支援。對此「週邊地區」的解釋，日本政府內部也有主張明白將台海及南海地區納入者^⑨。美國眾院議長金瑞奇在一九九七年年初訪問大陸時，向中共領導人提出美國將防衛台灣安全，以嚇阻中共武力犯台，他並於隨後訪台時，重申美國反對以非和平手段解決兩岸問題的原則^⑩。美、日兩國政治領袖的相關談話，說明了國際社會對台海安全的重視，似乎也透露了以一個較平衡務實的態度，處理兩岸關係的新體認。

註⑥ Segal, "China's Creeping Assertiveness," *op. cit.*

註⑦ AWSJ, April 25~26, 1997, p. 1.

註⑧ Allen S. Whiting, "ASEAN Eyes China: The Security Dimension," *Asian Survey*, vol. XXXVII, no. 4 (April 1997), pp. 299~322.

註⑨ Teruski Ueno, "Japan to Play Increased Military Role," *The China Post* (Taipei), September 25, 1997, p. 4; 中共反應頗強烈，見《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十月一日，第九版。

註⑩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三日，第一版。



面對此一新國際及亞太情勢，兩岸之間也必須相應調適，較之於亞太其他國家，台灣的處境更為困難。成為國際體系之一極之中共^⑤，必將享有更多的運作空間，在兩岸外交仍處於「零合」之際，台北的空間勢必受到壓縮，中共影響力的持續擴大，在放棄對台敵對式與鬥爭式的軍事、外交戰略前，又將加深台灣的不安全感，影響兩岸交流，「戒急用忍」政策，乃是此一背景下的產物。而中共與西方國家因結構性的差異造成的緊張關係，使得後者在與台灣進一步發展關係時，亦多所顧慮。另一方面，台灣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發展，符合當前國際社會的主流發展意識，在國際資金受到東歐、俄羅斯、和亞、非需求的壓力下，台灣作為全球第九大資本輸出國的地位，以及成功的政治改革範例，也提供了她前所未見的外交空間，李總統能赴亞、非、拉各洲訪問，實非兩位蔣總統所能預料。台灣外交空間的擴大，又將進一步遭致中共的反制，李總統成功地於一九九七年九月赴中南美訪問，參加巴拿馬運河會議及中美洲高峰會議，讓中華民國元首第一次出現重要國際場合，中共已經加強對中南美洲中華民國邦交國的爭取，中共與國際社會交往的更加密切，以及其活動能力的增強，又將導致其與局部國家或地區的衝突增強，予台北以喘息的機會。不論是美、日之間正在研議之東北亞區域反飛彈防衛體系的建立，兩國安保條約的續約、或是亞太各國對中國的潛在恐懼，都牽動了兩岸之間的互動聯繫。

七、結 論

台灣近年來對經濟升級所作的努力，以及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所扮演角色，已使得她在國際經濟的分工體系中，自原先的邊陲地帶，逐漸向半邊陲乃至於中心地帶轉移^⑥，資金與技術輸出的增加，進一步鞏固了台灣對外發展的信心。首任民選總統的產生，以及解嚴以來所從事的各項憲政制度與體制的改革，不但將執政黨與民衆的距離拉近，也使得台灣作為一生命共同體的國民主義體驗為之強化。

台灣內部政治共識意見的增加，長期而言固然有助於兩岸關係之趨於穩定，但在短期內，由於中共敵視態度不改，台灣尋求自我的意識趨強，對中共因素的考慮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明顯減少，都將對既有的兩岸關係產生影響。

影響之一，是攸關重大的各項公職人員的選舉，將產生結構性的變革，一九九七年年底縣市長的選舉中，民進黨獲得空前的大勝便是。過去統獨的爭論是選民投票之重要考慮因素，但隨著兩岸關係的開展，雙方在心態上的逐漸接近，加上台灣地區人民對北京政權壓制性政策的反感日漸強烈，統獨議程排除於選戰之外，勢將使過去制約民進黨得票之最重大因素為之消弭。

註⑤ 周煦，「全球情勢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十期（民國八十五年十月），頁一三。

註⑥ 有人認為台灣在七〇年代初期，即已自邊陲地帶進入半邊陲地帶，見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6.



民進黨對追求台獨主張的逐漸務實化與溫和化，承認中華民國主權已事實獨立不需重複宣布「獨立」，接受李登輝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等，均將對台灣內部生態造成結構性的衝擊。民進黨的大陸政策似乎也有重大調整的跡象，與大陸發生經貿聯繫似已不再是禁忌，自某種意義而言，「大膽西進」的主張較「戒急用忍」的政策更見積極性。另一方面，執政的國民黨的大陸政策，也反映了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因素，朝向更務實的「維持現狀」取代過去的「立即統一」政策。中共不宜將此一政治趨中原則與台獨對等，否則兩岸之間永無寧日。

影響之二，台灣要求國際空間的呼聲一定更為高漲，認為發展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重要性要超過兩岸關係，此一心理期望必與中共急遽上升之國際地位發生擠對，在中共不改其強力壓制的政策前，兩岸之間在外交戰場上的衝突勢將益趨激烈，基於兩岸互信之長期不足，台灣追求外交空間的行為，被北京方面視為尋求外力支援以遂行分裂之實的藉口。此一認知，不但無法取信於台灣人民，更已將兩岸之間的衝突，推向無可妥協的零和賽局。台灣不可能單方面一再表達善意與讓步，回應中共的強制打壓。中國大陸一時之間也不可能給予台灣較寬廣的活動空間，以免淪為「縱容台獨」之嫌。

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以及國際經濟區域化與重商趨勢，不可避免地將予中共在國際事務以更多空間。而中共政經分離之國際參與原則，勢必在許多地方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扞格。在海峽兩岸都無絕對實力排除對方之國際參與權利的前提下，若雙方無法達成外交休兵，未來兩岸關係不但無由好轉，彼此資源的消耗與抵銷也在預期。南非在兩岸外交競逐中所獲取的經濟利益，僅為一例。法國之所以不再出售武器予台灣，將來哥斯達黎加、瓜地馬拉等國是否終究棄「台」去「陸」，恐怕也都與中國大陸所提供的物質誘因有重大關聯。

海峽兩岸實力增長與民族主義興起的另一結果，是兩岸之間的物質互賴關係增加與心理互賴感的減低。過去雙方急於化解僵局創造有利交流條件的熱情已漸趨平淡。兩岸之間交流是否能儘速恢復，是否宜討論三通問題或更進一步協商和平協定，在當前的態勢下，急迫性都已相對降低。未來兩岸之間的交流將更多地集中於物質面，對精神面的交往暫難有結果。

不過，雙方交流的龐大利益，勢將適度抵銷兩岸之間的分歧，台港之間終於能達成九七後之航運協定，固與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面子有關，更與港台航線不可一日或斷有關。一九九五年台港之間貿易額近三百億美元，香港港口營運量每年達一三五〇萬個 TEU（二〇尺貨櫃），來自台灣的便占二〇〇萬個，給香港提供了十萬個工作機會。兩岸之間的經貿活動較台港更為密切，大陸市場對台灣經濟發展極為重要，因此，台灣支持美國克林頓總統無條件續予中國大陸以貿易最惠國（MFN）待遇，其理在此。兩岸之間在國際上可以創造雙贏的局面，然而雙贏無法建立在武斷的將國際事務以政、經劃分，進而單方面的要求台灣放棄參與「政治性」國際事務的權利的前提下。持續抑制台灣的結果，必然是日後更大而更強烈的反彈，鑒於「積極提升國際地位」，和「中華民國國號是提升上述國際地位之絆腳石」一直是台獨主張最



強而有力的訴求，北京方面對台北從事外交活動的打壓，無異是降低台灣方面對統一情緒的最佳藥劑，也是台海出現緊張的主要理由。資料顯示，中共對台強硬政策是台灣地區統獨勢力的最大變數，解決之道在於國際社會以集體安全的方式，共同以包容性的途徑，模糊解釋一個中國，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分別處理，如此，「一個中國」的概念才能同時並容於兩岸與國際社會。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亦應未雨綢繆，為兩岸僵局共謀化解之道，一味拖延，只有使問題在日後引爆時更加激烈。

*

*

*



Cross-Strait Relations After the 1996 Missile Crisis

Chien-min Chao

Abstract

Unable to adapt to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undergone in both sides,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met with new obstacles. They could further be strained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growing gap of power between the two entities; the new nationalism resulting from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s under the trend of Asian regionalization; the conflict of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conflict over sovereign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ze Taiwan/Mainland China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the emergence of new nationalism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s.

Key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hina's nationalism, Taiwan's regionalism, sovereignty disput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